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楊增新統治时期的新疆

——新疆回忆录之一……包尔汉（1）

金树仁統治时期的新疆

——新疆回忆录之二……包尔汉(124)

盛世才入新夺取政权的经过……宫碧澄(197)

盛世才是怎样取得新疆統治权的……周东郊(210)

盛世才在新疆的特务統治……周东郊(233)

1944年盛世才在新疆的最后一次大逮捕……李帆群(274)

吳忠信主政新疆紀略……曾小齐(289)

楊增新統治时期的新疆

——新疆回忆录之一

包　尔　汉

一　我的故乡、祖国

如果說新疆也有魚米之乡，阿克苏是可以当之无愧的。阿克苏是以阿克苏河得名的，譯成汉語是"白(阿克)水(苏)"。它汇合从天山南麓流来的昆阿立克和托斯干两条河，浩浩蕩蕩地往南流去，滋潤着塔克拉馬干大沙漠西北緣的土地。多少世紀，劳动人民在这里斬棘披荆，把它建成为盛产稻米、棉花、水果之乡，河里的魚也是捕之不尽的。

这儿便是我的故乡。

故乡是美丽富饒的。但是在人剝削人的旧社会里，劳动人民手創的魚米之乡却成了王公大人們的乐园。十八世紀末，活不下去的农民曾自发地起来反抗；但是在封建主的武装鎮压下，我的上五代祖帕拉提随着以玉素甫为首的二十多戶貧农离开了依列克村，逃亡到中亚。他們在继续西进的路上被沙俄的官吏們截留下，强迫他們定居到哈桑省內的森林里，要他們在那里伐木垦荒。这二十多戶流亡的貧农同原有的少数移民，被迫付出艰辛的劳动，在那里建立了农村。他們念念不忘故乡，就把这个新地方也叫作

阿克苏，尽管那里沒有清澈的大河。这个小地名一直沿用到現在。

我便誕生在那里，并度过了我的童年。

我的祖父郭拜都拉——腰已累弯了的伏尔加河上的縴夫，常常給我讲故乡的风物。他說过的下面的話，我現在还記得十分清楚："我們的故乡阿克苏才是眞正的阿克苏呢！那是在遙远的中国。中国才是我們的祖国呢！"

祖父爱恋祖国，总想在有生之年把一家人拖回去，尽管他也誕生在中亚。他說过："眞主把土地賜給人，人应該凭着自己的一双手来养活自己。但是只有祖国的土地才是最溫暖的。阿克苏河水比别处的蜜汁还会甜吧！"

到了1907年，也就是我的祖父故去的第二年，我跑到哈桑去投奔我的舅父，实現求学的理想。

原来我的父亲沙赫都拉在家里种地，生活是很苦的，他不主张我到外面去讀书。在母亲的帮助下，有一天夜里我悄悄地离开了家，搭上一輛馬車，两天后到达了哈桑。

我的舅父吉那都拉在哈桑作小买卖，收入微薄，但他終于帮助我进了寄宿小学，每天給我十个戈比，作为我的伙食、购买书籍紙笔之需。这一年我正十一岁。穷孩子讀书是不易的，二年后我略具写算知识，便希望能找到一个还能继续自修的职业，从而減轻舅父对我的負担，并能給貧苦的双亲一些补貼。1909年，我舅父把我介紹到哈桑的一家书店里作学徒。书店里当然不缺乏书，但是学徒的工作，一年到头总是从天亮到半夜。那时候，我的心情正像喉嚨干渴，面对着几皮口袋馬奶子，而又无从尽情飽飲一样。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一个来书店买书的商人談到，他們的商店需要能写会算的学徒。他們的商店在中国还有分店，比如新疆的

烏魯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地，那里业务兴隆，也需要人。我一听到新疆(那时候中亚商人是把新疆称作东土耳其斯坦的)，便想起了祖父的話，油然生了向往之心。幸好书店有沒有我这样的学徒并不影响它的业务，于是我便随着这个商人到他的斜米总店作学徒去了。

这个商人名叫司馬猛，是天兴行資本家依斯哈克的弟弟。天兴行是专門经营对新疆进出口貿易的，資金雄厚，是弟兄合伙的买卖。我在斜米工作了不到一年，終于实現了我的想望，被調到这家商店的烏魯木齐分店去。

1912年9月，我以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只身回到百多年来我的祖、父所依恋的祖国，后来还把一家人都拖了回来。

二　帝俄籍商在新疆

天兴行烏魯木齐分店开設在烏魯木齐南关的貿易圈里。当时人們把这条街叫作洋行街，因为街上的商店大都是帝俄籍商人开設的，商店的招牌上都写有"俄商"字样。

貿易圈这个名詞，就是在几十年前，內地人听来也是生疏的。它最早叫买卖圈子，实质上就是帝俄在烏魯木齐霸占的一块土地，同当年天津、上海的租界地几乎沒有什么两样。

帝俄政府以不平等条約——1879年«伊犁条約»，取得了在烏魯木齐設立領事馆的权利，同时在該不平等条約內还援引另一不平等条約——1860年«北京条約»的条款，取得了中国官厅"应給予所盖房屋、牧放牲畜、設立墳塋等地"的权利。这些所謂"給予"地，在市內的便叫貿易圈，圈里的一切事务都由帝俄的領事馆管理，中国官厅无权过問，虽然在上述的不平等条約內并无明文規定。烏魯木齐的貿易圈是1895年划的，有无文約，我不了解。我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天兴行的日子，这个貿易圈的范围是北起皇城巷，南至三通碑，东达义塚，西尽西河坝。《新疆图志》关于烏鲁木齐的貿易圈有这样的記載，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划貿易圈于迪化，是三道桥南官大路东西两段地方。

当年开設在烏鲁木齐貿易圈里的較大的洋行一共有八家，其中最大的是韃靼人胡賽音、哈桑兄弟等的吉祥湧；其次是韃靼人伊斯哈克兄弟等的天兴行，烏孜别克人伊敏江、土尔逊巴巴的德盛行，烏孜别克人美尔沙里、拉合滿巴依的德和行；再次是烏孜别克人滿素尔江的吉利行，烏孜别克人塔居斯曼的仁中信行，韃靼人孜牙巴依的芝盛行，烏孜别克人阿布特的茂盛行。这些商行在斜米、塔城都設有总店和分店，有的还在吐魯番、奇台等地設有分店①。商行的資本家都是随着殖民地掠夺而兴起的暴发戶。比如吉祥湧的創始人拉馬占阿吉，原来是个車夫，他的承继人——他的侄儿胡賽音是个貧农。

新疆原来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十八世紀以来，外資逐漸侵入，到了十九世紀中叶，它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主要是帝俄和英国）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猎取地了。单以我所在的天兴行說，每年它的烏鲁木齐分店从俄国运入的各种布匹就有二千捆，每捆二十四，每匹三十米，合計达一百二十万米，它从新疆运出的土产，仅棉花一項就有九万余公斤②。

---

① 1907年前后，烏鲁木齐帝俄籍商三十余家，商人（包括行商）八百余人，年終存貨多达三十万卢布。

② 本世紀初，从烏鲁木齐经由帝俄籍商人每年运入俄国的羊毛值五十余万卢布，羊腸值五千六百余卢布。我到烏鲁木齐的那一年(1913年)，新疆对帝俄的貿易总額，輸出为九百八十万卢布，輸入为八百四十万卢布。土布（新疆把土布叫作褡連布）紡织业在洋布的大量輸入下，已濒于破产。

当年这些洋行经营的进口貨以布匹、铁、砖茶、紅茶、糖、棉线、石油、紙烟、火柴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出口貨以牲畜、羊毛、羊皮、羊腸、棉花、干貨、兽皮等为主。它們经营土产的方式是，在生产者需要資金的时候，以預付貨款的方式把进口貨和一小部分現金付給生产者，訂立如期交出土产的合同，如果到期不能交出，則須加几成甚至加几倍处罰。当年新疆的农、牧民因封建剝削残酷，加以生产技术落后（当然这也是封建制度的結果），只能維持簡单的再生产，每年都需要举借生产以至生活資金，而地方上的高利貸使他們无法喘息，因而宁願接受洋行的訂貨預付款。至于大地主、大牧主，因生活上的大量消耗，以及需要洋貨供自己享受，也大都听凭洋行摆布。就我記忆所及，洋行同农、牧民或地主、牧主訂立购貨合同，一般是通过地方商人。因預付款而取得的利潤是非常大的。比如当时棉花的市場价格每百斤为新疆紙币四十两，而因預付貨款，每百斤只給十五两到二十两①。这样，除中間人的佣金外，洋行也获得将近一倍的利潤，而且預付款大都折成洋貨，洋行从土洋貨的差价上获得的利潤就更大了。

但是这些洋行当年所以暴发，而且几乎掌握了北疆的商业经济，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经营进出口貿易不納税。1851年在不平等条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內規定“通商原为两国和好，彼此两不抽税”。以后在1862年《陆路通商章程：续增税則》、1881年《改訂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約內，規定中俄两国边界貿易在百里內均不納税。而在1880年《改訂条約》这个不平等条約內竟写下“……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

① 新疆紙币当时是以两为单位，1914年紙币一百两約合白銀六十两。

及关外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議定稅則，即将免稅之例废弃。”

清政府以后曾几次向帝俄政府交涉，取消不納稅的規定，但都无結果。我到烏魯木齐时，帝俄籍商人经营貿易依然不納稅，不但自己不納，还往往包庇中国商人不納稅，甚至在新疆境内作內貿也拒不納稅了①。这样，他們所获的利潤就更大了。而且那时候帝俄正在奖励本国貨出口，对运貨去新疆的商人不但免稅，而且还給予奖励。有一个时期，已繳稅金的商品，如果改运新疆銷售，帝俄稅务机关根据商人的申請，查明属实，就把已繳的稅金退还給申請人。又俄商凡运一馬馱俄貨入新疆，俄政府有关机关还給与业主十六个卢布的奖金。当年中国商人从天津、北京运貨来新疆，或由新疆运貨去內地，要通过重重稅卡，当然不能同俄商竞爭，北疆的商业经济便由这些俄商操纵了。

俄商所持的借以免納稅款的通商执照，是由帝俄領事发給的，但須有中国外交官在上面签字。这种执照当年在新疆通称“通商票”。按照原来規定，通商执照的有效期为半年，并須在票面上注明商人姓名、貨色、包件数目。但后来俄領滥发，并把有效期改为一年，且不詳注持票人姓名、貨色、包件数目，而只写商人某某赴天山南北各城販貨，随带本金俄帖若干、銀若干两（当年英帝国主义援例，英籍商人同俄商在新疆享有同样权利）。这样，稅卡既难于查驗，而且俄商依特外势，往往也不听稅卡检查②。此外，中国商人

① 当时帝俄籍商人还从汉口販运土产经新疆出口，但是有时候他們在沿途出售（比如在酒泉、哈密等地），也拒不納稅。

② 这里且举一个事例：哈密商人阿赫毛拉（此人后来在盛世才时期曾任省銀行副行长），某次去四川办貨，借用吉祥涌的通商票，他回来路过甘州，稅卡要他上稅，他一时沒有找到通商票，就順口說他是西国人，竟混过去了。

往往出价借用俄商的通商票，或者通过俄领在新疆各大城镇指派的“商約”（也称“商总”，維語Ak-sakal，意为“紳耆”，表面上是各該地俄商推举的、办理有关俄商事件的人，实际却代行領事职能并担任坐探）向俄領領取通商票，用来冒充俄商，借以免納各項稅金并欺压本国商民；帝俄領館为了拉攏地方商民外向，当然也乐于发給。而那些商約还发給俄商、甚至中商手书小条，只注明某某运貨若干去某地，作为临时性的、代替通商票的免稅证明。在楊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截至俄国革命、帝俄势力在新疆垮台前，有关这类事件的交涉，层出不穷。

当年，新疆土产每年经由烏魯木齐运往俄国的有十五万駝馱，每馱按十普同（每普同合十六公斤）計算，就有二万四千吨。运入烏魯木齐的洋貨，数量上也不少于此。每当春秋两季，貨物大量出入时，駝鈴响徹烏魯木齐——塔城——斜米的路上。新疆的土产由此再往下新城（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运发，在当年欧亚商人云集的下新城临时交易市場上，新疆土产是惹人重視的商品之一，经营这項商品的商人，以及购之作原料的工厂主們，都直接間接地榨取了新疆劳动人民的血汗，从而发財致富①。

我所在的天兴行的資本家就是其中的一个，这里且具体而微地介紹一下它的情况。

当年天兴行总店在斜米，经理是依斯哈克，他們弟兄四人，除他本人和一个弟弟司馬益在斜米外，塔城分店是由他的弟弟阿里

① 按当年帝俄对新疆的进出口貿易，北路以斜米为总汇，南路以賽尔干为总汇。我国土产经伊、塔两地运往俄国的不只是新疆土产，俄商还从内地販运土产，或经海道运往西伯利亚，或经嘉峪关运经新疆入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夫和依布拉音主持，乌鲁木齐分店的经理是外聘的帝俄籍鞑靼人哈桑，吐鲁番分店是规模最小的，因为经常直接同当地人接触，依斯哈克任用了一个吐鲁番当地人穆海特作经理。

天兴行在新疆的各分店，每年都按不同土产的生产季节，或直接派店員，或委托中国商人到各产区去訂立收购合同，有些生产者还直接到各分店的門市部来买卖貨物或讲交易条件。許多中国商人和資金較少的帝俄籍商人，也与天兴行有交易往来，但其中只有极少数商人同天兴行有单純的貨币資金往还，而且事例也是不多的。所有的洋行都不作买空卖空的买卖，而且也不注重点綴店鋪門面。

洋行收购的土产在外运前要经过加工，因而它們所获的利潤里也包括着对加工工人的剝削。比如夏羊毛（五月份剪的）收购后要按毛色分类，投入水槽攪拌，洗去土砂、粪便等污物，再晒干、打包。乌鲁木齐南樑，有个地方叫羊毛湖，就是当年洗羊毛的地方。秋羊毛（九月份剪的，毛短，主要用于制毡子）一般不洗，但也要按毛色分类。皮棉要经过清花，羊腸要由专設作坊刮去腸油、腌制，……各种土产都要按其性质加以不同的包装。比較大的洋行都有自己的加工作坊。

加工工人，主要是临时工。我所在的天兴行在忙时要雇一百多个临时工，临时工的每日工資按劳动性质的不同，折合現在的人民币二角到六角，工資之外，只供应茶水，工时每天十至十二小时左右。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讲，工人只能維持簡单的生活。这些临时工主要是維吾尔人，以及少数哈薩克人和回族人。也有女工，大都作清花、按色别分类羊毛等工作。同内地的工厂一样，洋行的上层分子对女工往往加以人身污辱。

因为新疆的土产出口，牲畜也占大宗，所以洋行还经营牧場，来牧放他們收购的牲畜并从而孳生幼畜。

洋行的牧場最初是根据前述不平等条約取得的，但在不平等条約內所指的，不过是供領館及侨民临时寄牧自用牲畜的地方，但洋行則不但任意扩大这个地方，还用欺騙和行賄等手段霸占水草丰足的牧地。比如天兴行在昌吉县三屯河地方就有一大片草場，经常在那里牧放的羊群有二千多只，其他牲畜也为数不少。据我所知，天兴行的这片草場就是用行賄及外交压力从县知事手中取得的。

当年奇台县属南山白楊河以东的牧場，尽为天兴行等十余家洋行霸占。1915年省长楊增新曾令交涉員向帝俄駐迪化总領事交涉，俄商牲畜不得强占民地牧放。在他給交涉員的令文里說："且該俄商等故意纵放牲畜，伤害禾苗，一经百姓查問，动启反噬行为。甚至割民之耳，殴人致毙……該俄商等販买牛羊馬匹不下十余万之多，霸占山場粮地，长此牧放孳生，实属无此办法。……"① 当然这类交涉是得不出具体結果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新、俄間的貿易趋于萎頓，一个时期若干洋行轉向以经营牧业为主，成了大牧主。

洋行对职工的剝削也是残酷的。例如天兴行烏鲁木齐分店的固定职工通常在十五人左右。经理哈桑是資方代理人，每月薪資約合現在的人民币二百五十元，食宿均由洋行供給。一般职工的薪給，除收皮等专家和会計略高外，店員和学徒月薪合現在的人民币二十到四十元。学徒虽由洋行供給伙食，工資也都被簡单的生

① 楊增新《补过斋文牘》庚集一，1頁。

活用度耗去。这些职工，除了经理，每日工时都在十小时以上。一年間除了开斋、宰牲两个节日，是沒有休假日的，而且在节日里，职工們要参加招待客人的工作，比工作日还要劳累。1917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我同德合行的夏卡夫联絡不少洋行的职工，联名向資方提出了星期五休假一日的要求①。資方同我們到帝俄駐迪化領館去打官司。領事迪牙關夫鑒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对我們让步，結果，我們取得了星期五休息半日的权利；过了一年，又爭取到星期五全日休息。同我共同領导这次斗爭的卡夏夫后来去苏联了，听說他現在在烏孜别克共和国科学院作院士呢。

洋行資本家那时候有事便找帝俄領事館，一般很少同中国官厅往来，只是每年春节按中国商店的例子，宴請地方官宪，并打制精美的洋点心餽贈有关的官府和中国同业。他們請客时一定把帝俄領事也請来，以壯他們的声势。他們心里瞧不起中国官宪，但是摸清了中国官場讲面子的风气，遇到机会总是不惜金錢进行拉攏的。比如当年假道俄国往来北京的官員們，都接受过俄商在科米、塔城等地的"盛情"招待。这些俄商在这方面送人情，作为此后取得受招待者的回报。当然，除此之外，遇到非通过中国官厅才能滿足自己的願望时，他們也是暗中行賄的。那时候的吐魯番县知事张华龄、迪化县知事陈继善都受过俄商的多次賄賂，因而在俄商同地方商民发生債务和其他糾葛时，上述的两个县知事总是偏袒俄商的。

在这方面，当时的省长楊增新却是清白的。实事求是地說，

① 伊斯兰教徒把星期五叫作"祝馬日"，是大祈禱日，所以把每周的休息日放在这一天。

杨增新本人直到他被刺身死，从来沒有接納过俄商的賄賂。他从1912年主政起，屡屡为有关俄商、英商的交涉伤脑筋，他深深了解吃这些人的錢无异把剑柄給人，会因此身敗名裂。他常常告誡他的部属不得与俄商作私人往还，互相餽贈，以免惹事生非。那时候各地的俄国商約依恃外力，威胁官府；官府为了保持自己的祿位，也多曲予迁就，甚至在商約到县衙办事时，有的县衙竟大开中門，鳴炮相迎。楊增新为这件事曾三令五申，要各县知事注意国家体面和自己身分，取消这种媚外的接待仪式，并定下接待商約的办法。当然单凭这些是不足以戢俄商的气焰的，只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白俄势力在俄罗斯国内被彻底消灭，俄商才漸漸老实了。但是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还拥有大量資金①，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地位。

1917年俄国革命后，許多俄商把資金和家眷都迁入了新疆，天兴行的資本家依斯哈克便是其中的一个。俄国革命和国内战爭，削弱后来竟至断絕了新疆俄国間的貿易，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义制度在俄国国内被鏟除掉，在流亡到新疆的俄商看来，这无异是給他們敲丧钟。他們日夜注意俄国国内革命局势的发展，在反革命的白俄政府在伊尔庫次克成立后，俄商还派人去与它取得联系。在我未离开天兴行前，经常看到这些褪了色的資本家经常聚集在一起，互相探訊有关俄国的消息，并往往从主观願望出发，編造一些自慰的消息，比如說英日联合进攻俄国革命政府了，某某白俄将軍在俄国的某某地方得手了，美国軍队攻入彼得堡了，英国干涉軍占領塔什干了。而最值得介紹的是，当时有个俄国老律师皮斯特洛渥，他逃来烏魯木齐后，自称"灵媒"，能招神灵附入人体，解答世人提出的禍

① 天兴行的資本，1914年前后为二百万金卢布，合黃金三万八千两。

福休咎等問題。这同解放前汉族中的扶乩、跳大神等有些相似。洋行街的俄商們往往把这个老头請来，大家坐在黑屋子里作招神的把戏。皮斯特洛渥既迷信而又狡猾，他借此来騙取俄商們的尊敬和款待。有几次我也参加了，看出了这个俄罗斯老头的門道，我就装作神灵附体，起初用脚来踏地板，表示神已降临，随后便改变嗓音回答在場的"俗子凡夫"們的問訊。每当他們問到"布尔什維克能不能消灭？"我总是回答："不能消灭！"或"消灭不了！"問到"沙皇什么时候复辟？"我总是回答："公羊生羔的时候！"或"什么时候也不会复辟！"为了取信于在座的大腹賈并迷惑皮斯特洛渥，我在到皮斯特洛渥家去的时候，找机会把他家里的小东西悄悄地揣进怀里，在招神的时候再悄悄地从一个角落上把它丢到大家围坐的桌子上，使得这些以神来自慰的人們益感惊奇，他們說："全能的神啊，把信物都带来了！"因而对我装神时回答他們的話，更感到徬徨不安。

依斯哈克为人傲慢，对本店的职工更暴躁，随意辱駡。有一次在招神的时候，我假借神灵附体，打了他一記耳光。当时把他和皮斯特洛渥等人都吓坏了。皮斯特洛渥战战兢兢地說："神可别生气啊！是我們不好啊！"我算痛快地发泄了对这群洋商們的憤恨。我的行动后来被同事塔依尔阿洪猜到了。我对他說："你不要揭穿，这是我們对巴依們的'盛情'的酬答！"①

他們往往还請阿洪誦经，祈祷眞主降福給布尔什維克，保佑沙皇复辟。

我們当时并不了解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眞諦，但是由于

① "巴依"，維吾尔語，意为"財主"。

自己所处的地位并接触过一些进步讀物，却了解到巴依和我們不是一类人，而是利害絕对不同的对立的人，那么，这群俄商們所憎的，一定是我們应該欢迎的。于是，他們祈祝的我們便詛咒，他們詛咒的我們便祈祝，不能让他們再得到他們所失掉的东西，这是我們的喜悅。在当时这种情感可以說是一种不知不覚的、自发的阶級情感。

現在回想起来，資产阶級为了恢复他們失去的地位，是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在中国参加欧战后，1918年日本派一批所謂調查員到新疆来。1919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个子来到我們的商行里，皮鞋踏在地板上吱吱作响。有人告訴我，这是日本人。不久后这个日本人被依斯哈克和其他俄商請到家里去喝茶，我趁作翻譯的机会，听到这些俄商对那个日本人說，他們想加入日本籍，从而取得日本保护。日本人回答他們說，如果有四十戶俄商申請加入日本籍，日本帝国政府可以借此向中国政府交涉，在烏魯木齐設立領事館，"保护"他們的"权益"。但是后来，俄商想加入日本籍的湊不够四十戶，再加上其他原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想望沒有实現。

俄商在俄国革命后，有一部分歇了业，大部分則轉营內貿，新疆地方同苏联恢复通商关系后，資金雄厚的俄商又兼营起內外貿易。当然，他們在帝俄时期所享受的"特惠"都沒有了。他們看到形势一时不能如他們的主观願望轉变，便申請加入了中国籍。一直到1922年我离开天兴行，像吉祥涌等几家商行，在新疆的商业经济上还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到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有些人还登上了政治舞台。至于他們的生活享受在社会上是首屈一指的，他們起居飲食的豪奢，就是当时新疆的讲究物质享受的大官僚們，也是难望其項背的。

最后还应該提到一件事。这些俄商們都自命为虔誠的伊斯兰教徒，但是他們却经常借宗教来行小惠，欺騙教徒。比如在教規上有扎卡提稅，即教徒每年要以自己动产的四十分之一"接济"穷人。天兴行的执事人在"接济"之前，总是吩咐我們这些学徒把滯銷貨和积压多年业已变质或不堪着用的东西从栈房里拣出来作为"接济品"。再有，有的債务人眞的还不起欠他們的財物时，他們也来一套"宗教仪式"，把負債人应該还他們的財貨折成貨币，然后拿出一包东西作为这笔款的代表，当着負債人的面把这个包在念罢祈祷詞后递給負債人，算是他們的"慷慨"贈賜，随着又把这包东西从負債人手里取回，算作負債人还清了他們的債务。他們說，他們这样作是奉行眞主的意旨。在当时，穷人的覚悟尚未提高，有的眞的被他們的这套手法蒙蔽住了。

前后十二年的洋行生活，使我明白了不少人生社会的道理，为了进一步滿足自己对这些道理的追求，在这十二年里我还从俄国买来一套多年制中学的全套課本和新书刊进行自修，同时还学习汉文汉語。天兴行可以說是"我的大学"。在写这段东西时，我曾翻閱几十年前仅存的笔記本，发現在一个笔記本上有当时我用汉字写的一句話："小子讀书不用心"。当年硬挤时間自修和老板对我以及对同事和穷苦人民的剝削、欺騙等情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了。可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領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往日的情景是一去不复返了。

三　在革命动蕩中的两件事

1912年9月我踏上祖国的土地，距武昌起义已经将近一年了，可是我在塔城街头并沒有看到什么新的气象，副都統出門还是

坐轎子，鳴鑼开道，衙門口还摆着棍棒和囚人的木籠。市集和一些广場上公开摆設賭摊，賭博拈撮子在那里騙人，有时竟大打出手①。

当时，我对这些現象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覚。在斜米我从报刊和人們有关时事的談話中，知道祖国起了革命，清朝的皇帝已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当年在俄国，談論革命并不新奇。对一些人說来，革命是毀灭的代用語；但对广大的人民說来，革命則是希望。可是起了革命的祖国，怎么看不出什么含有希望的东西呢？据天兴行塔城分店里的人讲，新疆現在还分成两派，新派本年初在伊犁鬧革命，杀了伊犁将軍，成立了革命政府。旧派以烏魯木齐为中心，出兵"討伐"。他們双方在伊犁到烏魯木齐的大路上固尔图等等地方打起来，而且打得很厉害。后来北京皇帝退了位，成立了中华民国，新疆巡撫"袁大人"不得不派代表同伊犁談判和平，6月間双方終于在塔城簽訂了和議条件。現在"袁大人"已经回了北京，新疆由"楊大人"統治了，听說官衙改成了都督。只是烏魯木齐同伊犁还沒有和好，同时，南疆一帶也很混乱。

根据分店里的同事們的談話，新疆是在革命和动蕩里，不过我从塔城去烏魯木齐的路上，却沒有发現什么不安的現象，只是烏苏城內外駐扎着很多省里的軍队，据說是准备往精河开的。

到了烏魯木齐安頓下来之后，我的对祖国的关怀和好奇心驅使我接触現实，从而听到、看到許多事物。現在回忆起来，其中有不少已经为后来的报刊或专著所記述，在此地沒有重述的必要，我只把下面的两件事写一下。

---

① 新疆土語把靠賭錢騙人的人叫作"賭博拈撮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